

大将观点31

# 超越教条与务实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

丘光耀 著

大将出版社



大将出版品第273种

大将观点 31

超越教条与务实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

作者：丘光耀  
主编：刘艺婉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7年4月20日

定价：RM 50.00

版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ew, Kuan Yau, 1970-

[Chao yue jiao tiao yu wu shi: Malaixiya min zhu xing dong dang yan jiu]

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 / 丘光耀著

(大将观点：31)

ISBN 978-983-3098-98-9

1. DAP. 2. Political parties--Malaysia. 3. Malays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 Title. II. Series.

324.2595D

#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576,3861

8537

8665

谨以此书献给

所有为了促进马来西亚社会民主化而

奋斗不懈的马来西亚同胞

## 自序

这是一本不讨好任何一方的研究“文本”，书中所书写的人、事、物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它不受民主行动党的“正统史观”束缚，不偏袒民主行动党的任何派系或领袖，不为任何敌视或拥护民主行动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服务。当然我也不自诩绝对的客观中立，亦不标榜超越党派偏见，更不以什么“边陲”或“反中心”的史家自居。

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名曾经在民主行动党圈子活跃的前领袖，要撰写一本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能够引起各方重视、能够不违背史德的民主行动党历史，确实要比任何无党籍的学者都来得困难。我打从博士论文立题开始，着手收集、考证、筛选和运用史料来叙述、建构、诠释和评价这段历史，到论文正式通过学位答辩委员会口试，再到今天准备将之付梓，我都在反复思考：作为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我能称职地写出一本令“读者”满意的史学作品吗？

我不得不自问自答：到底谁是我的“读者”？我的论文指导教授？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学界的朋友？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我的同志？我的政敌？马来西亚的选民？主流和非主流媒体？还有未来许多将在政治圈、学术圈后进的同仁……他/她们将会如何看待这个“文本”？

不同的“读者”，基于其“理解前结构”（或干脆曰“成见”）不同，肯定会衍生出不同的“读后感”，即使同一名/类别的“读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阅读，亦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无法一一讨好所有的“读者”，也不准备那么做，我只期待大家能基于历史理性来阅读民主行动党的过去，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的民主行动党，肯定会有所裨益。再则，不论您喜欢不喜欢，民主行动党作为一股政治反对力量，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中将会继续存在。要和这股力量打交道，任何背景和动机的“读者”，都可能从这一“文本”中找到他/她要的东西。但愿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政治世代的“读者”都能按“社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重新发现阅读这一“文本”的兴趣，或对这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诠释。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梁元生老师，没有他的厚爱和宽容，我的背景几乎不可能被中大历史系博士班录取。在跟随梁老师的岁月中，我在治史的方法学上大大地开阔了眼界。此外，梁老师也给了我宽广和自由的研究空间，让我在高度自律的框架内如期完成博士论文。我要感谢的还有联合督导我论文进度的叶汉明教授，她的循循善诱，让性格自负和好辩的我，逐步学习到对异端的尊重和宽容。我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特藏的邱淑如小姐，她在我查寻近现代马新华人政治文献资料时给予许多专业意见和协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广州暨南大学社科部的高雄飞教授，以及香港著名左翼学者鲁凡之先生，两位老师的思考，让我更透彻地认识和反思民主社会主义在亚洲土壤所面临的挑战和调适。还有瑞典社会民主党原副国际秘书罗惹·霍赫（Roger Hallhag），他是我接触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桥梁，感谢他为我提供的机会和鼓励，1996年到瑞典的学习之旅，让红玫瑰的种子从此厚植在我心房。

再者，我要特别感谢林吉祥和郭金福两位党领袖对我的信任，当他们知道我论文研究的范畴后，就毫不设防地让我自由查阅党总部档案室里的所有资料。另外还有党元老刘德琦为我提供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口述历史素材作参考，党工黄雍国协助我运算电脑资料，社会主义青年团总秘书陆兆福则为我提供许多新文献和解读第一手的中央党务动态，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我根本无法完成这一“文本”的书写。

我真的很庆幸，在我的前半生有机会在香港中大度过充实、自由和丰盛的三年，但我更感欣慰的是，我高中毕业后就加入民主行动党，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和党总部活动。坦白说，是这个圈子培养、型塑、成就了青年的我，我从漫画少年一路走到历史学博士，民主行动党和林吉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我永远铭刻于心。

我如今虽已不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前线，但依然密切关注国家的民主化发展。投身马来西亚社会民主化运动的同志们，我衷心企望这一“文本”对您选择的道路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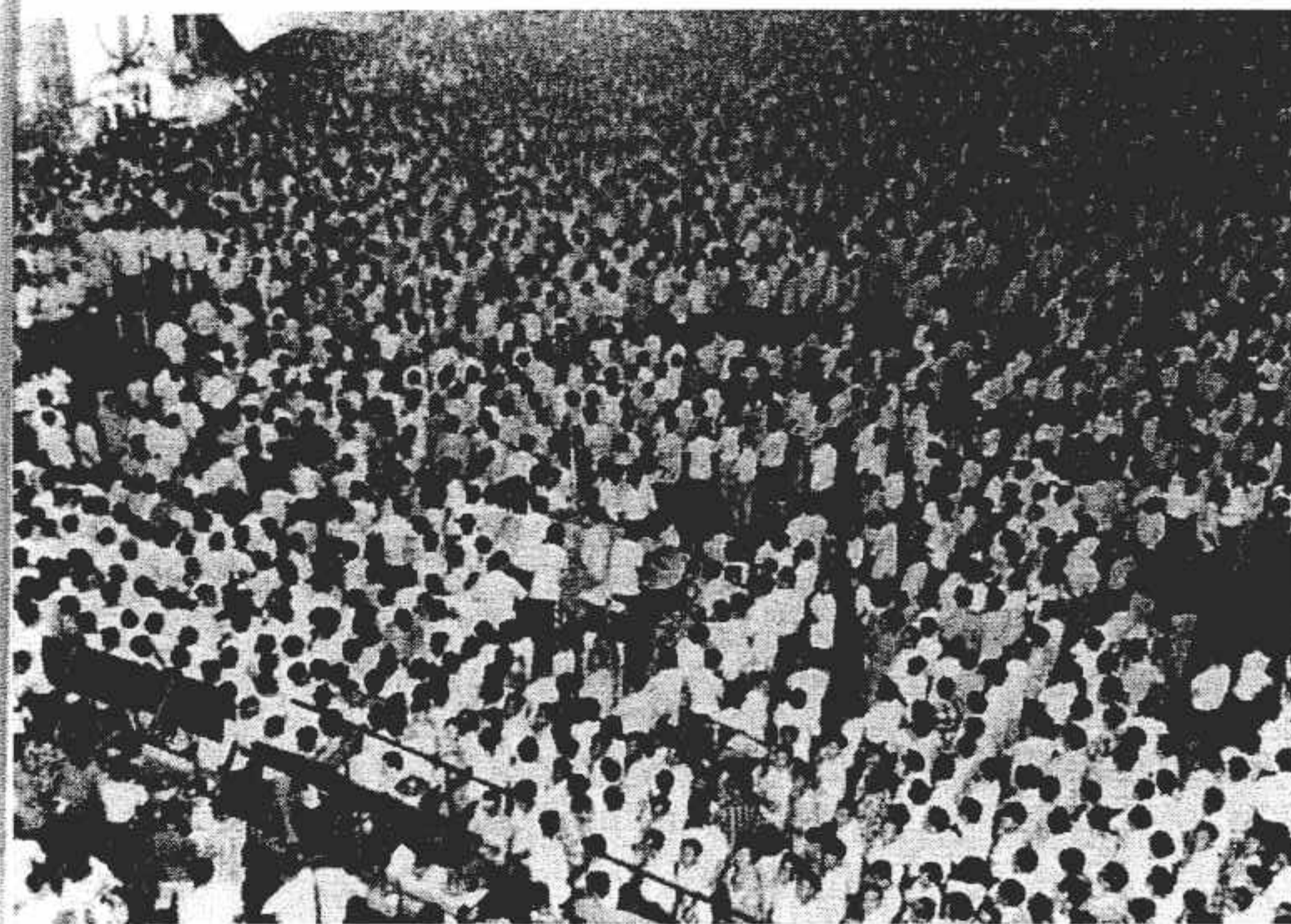
2007年3月3日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金钻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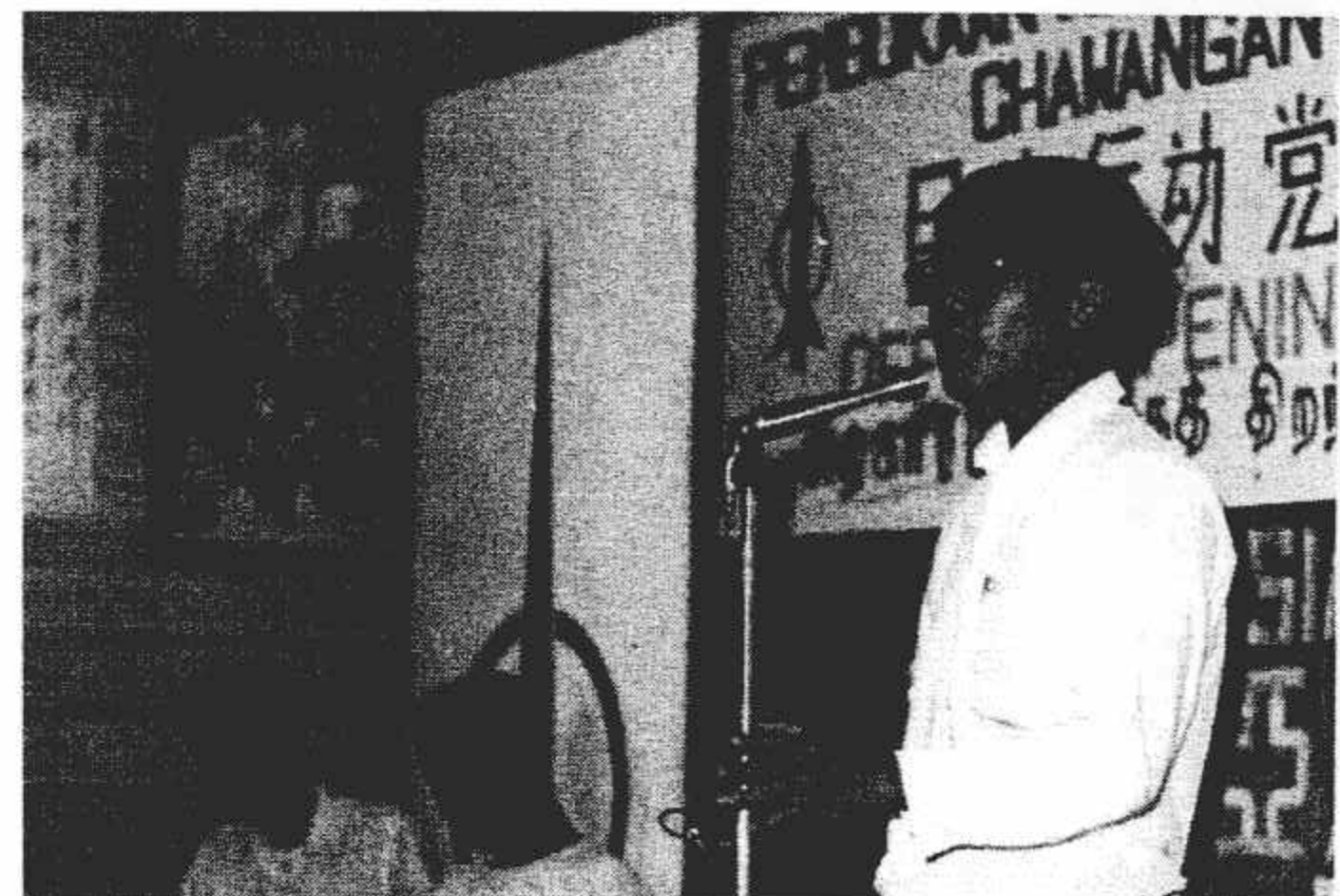
1966年，党主席曾敏兴医生为行动党的诞生揭幕，见证者包括蒂凡·纳和吴福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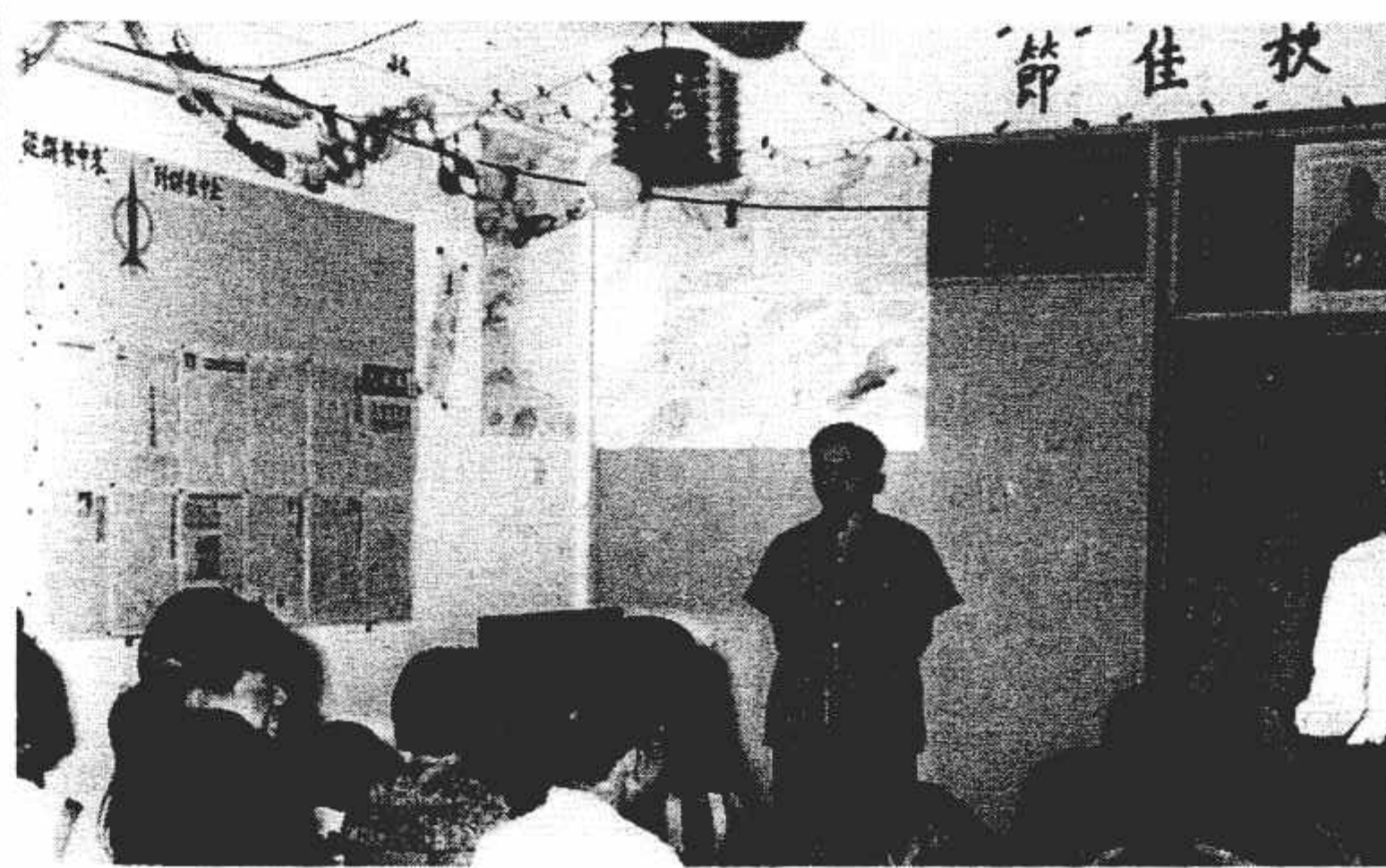
1967年3月20日，蒂凡·那在东京出席由德国费希·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社会党国际亚洲社会主义者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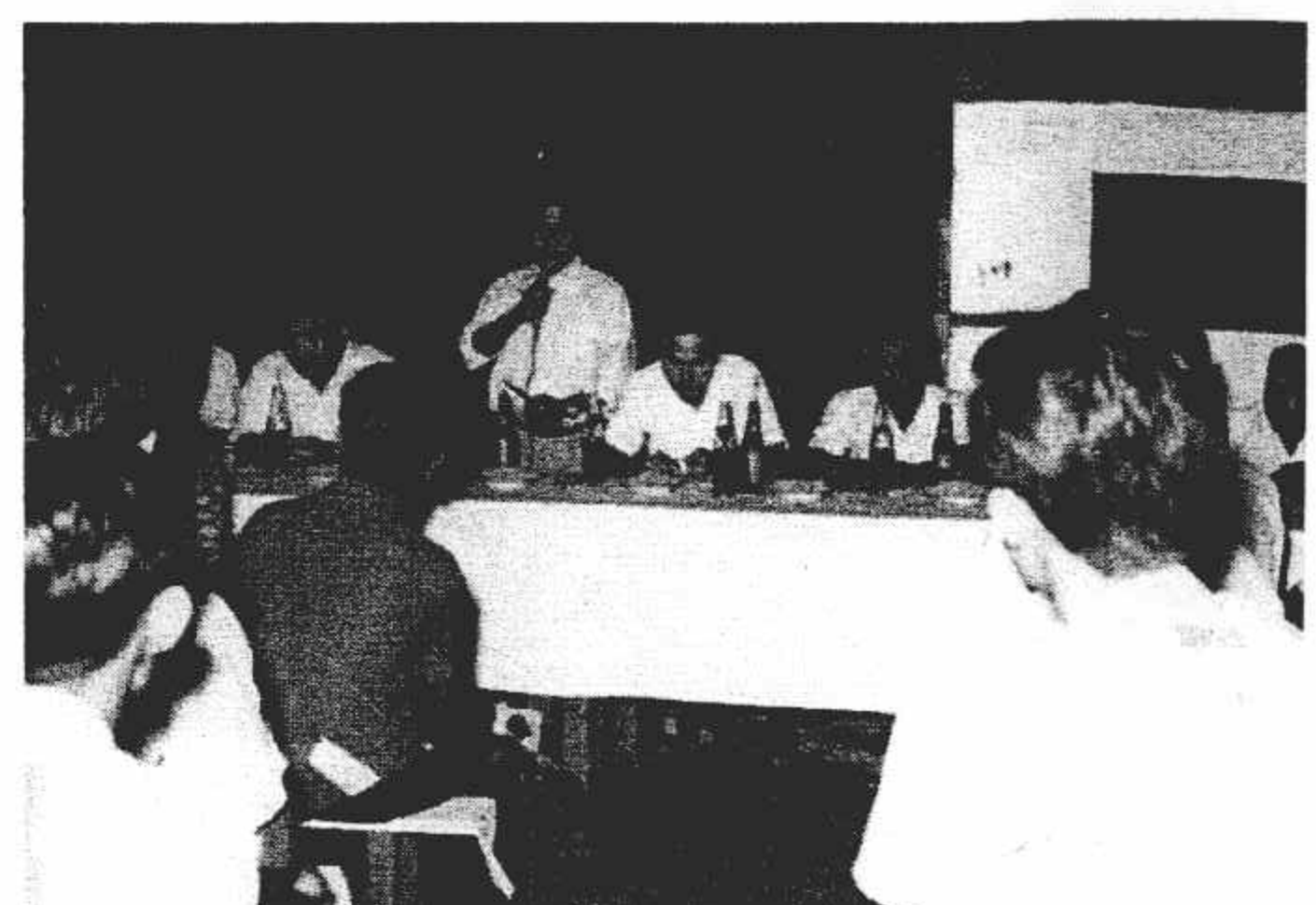
建党初年的行动党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1968年5月5日，范俊登受邀在吉隆坡增江支部立仪式上讲话。



1968年的林吉祥，已是行动党崛起的政治新星。



站立演讲者为行动党第二任秘书长吴福源，党徽的设计概念源自于他。



1970年代初的林吉祥从严治党，经常巡视选区，监督行动党代议士的选区服务工作。这是他在霹雳州双溪古月支部主持开幕仪式时留影。



李霖泰，相中最俊俏的行动党青年领袖，他是怡保行动党支部的发起人之一。



1970年10月2日，林吉祥在获释后的翌日召开记者会。他于“5·13事件”爆发后被联盟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了十六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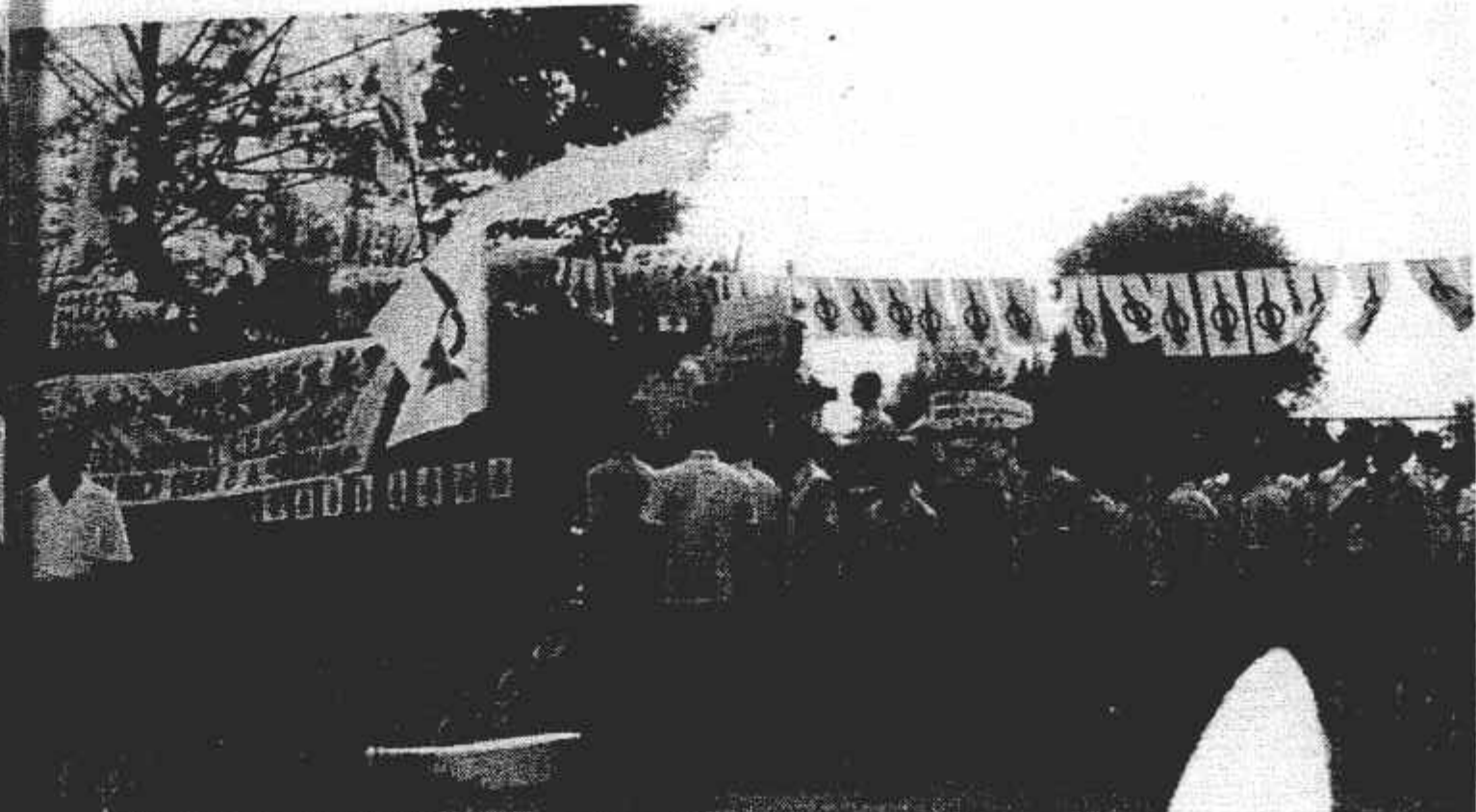
1970年代的林吉祥，当选国会议员后还是穿着草鞋，深入群众。



1970年3月1日，社会党国际秘书长汉斯·惹尼斯杰到访行动党。刘德琦和一众党领袖及干部盛情接待。



叶锦源摄于1972年4月6日。他在1974年大选后逐步被党中央边缘化。1978年因被指“党中有党”而遭中止党籍，后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党，同行动党分庭抗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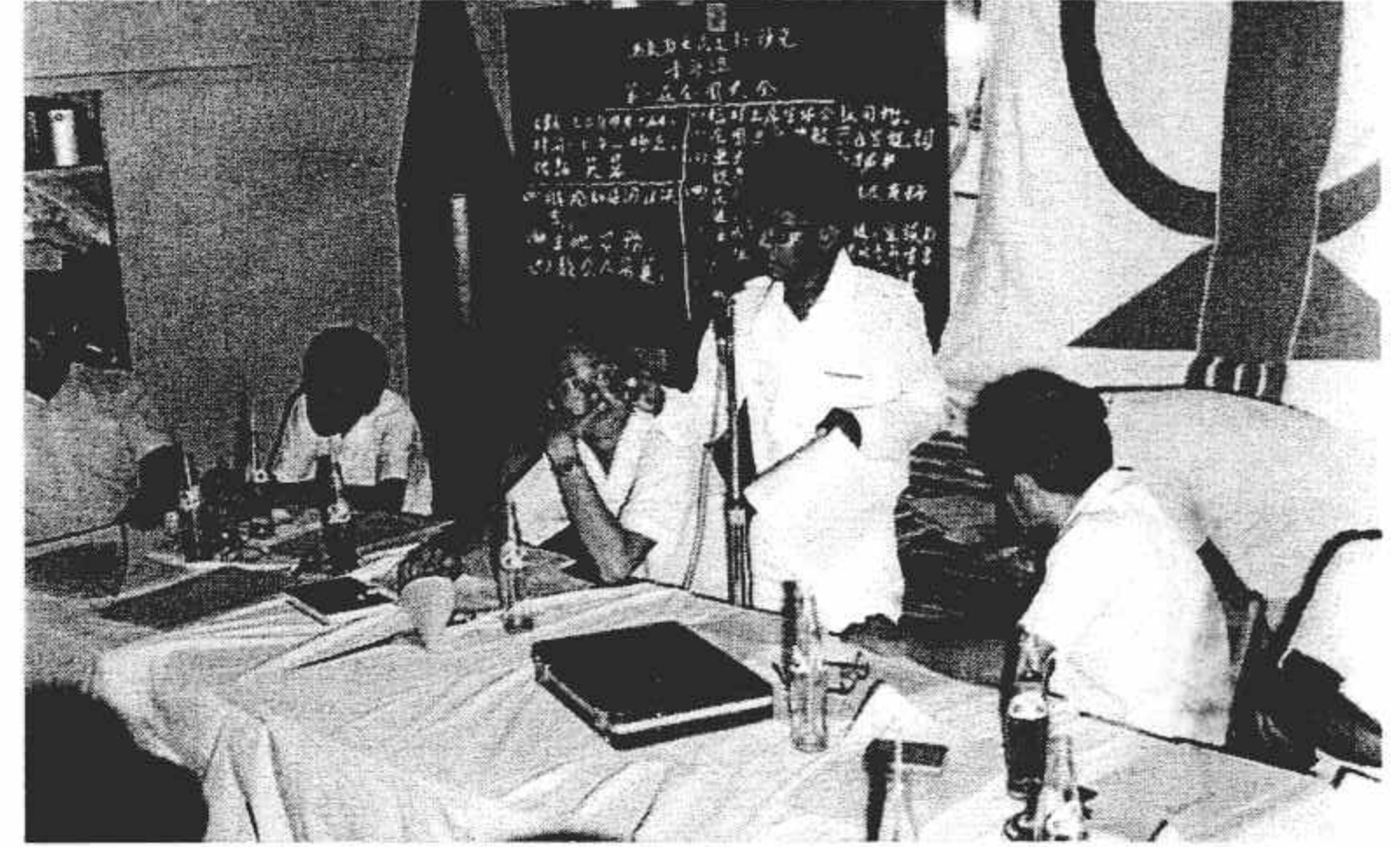
1972年7月16日，行动党于芙蓉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议决开除吴福源和苏里安党籍。图为大会场外张挂各支部代表支持清除“3D分子”的布条和海报。



1978年全国大选，行动党的中选议员阵容。是届大选，该党共赢得十六个国会议席和二十五个州议席。



1978年霹雳州领袖为林吉祥的第一本政治文集《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举行发售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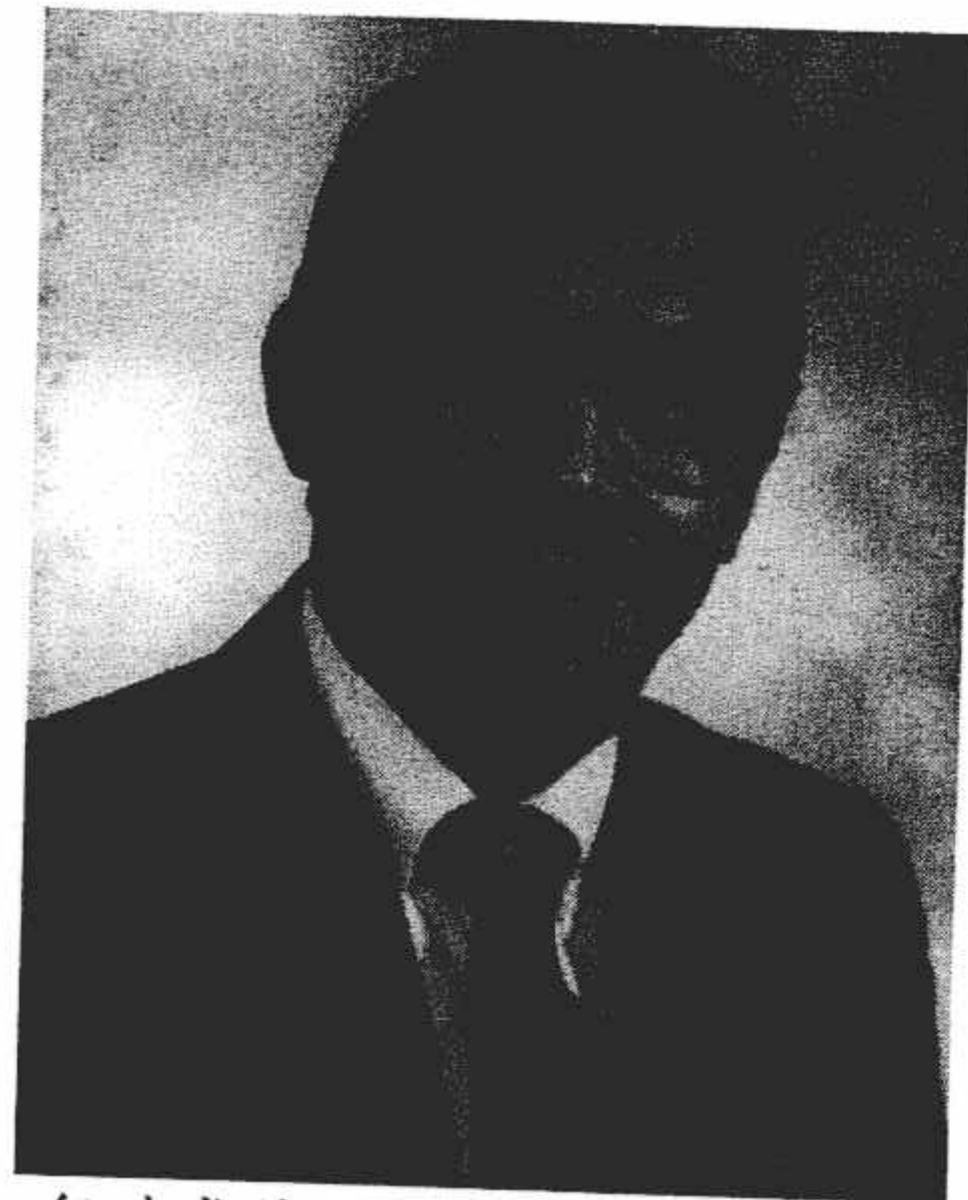
1973年4月15日，行动党青年组正式在芙蓉宣布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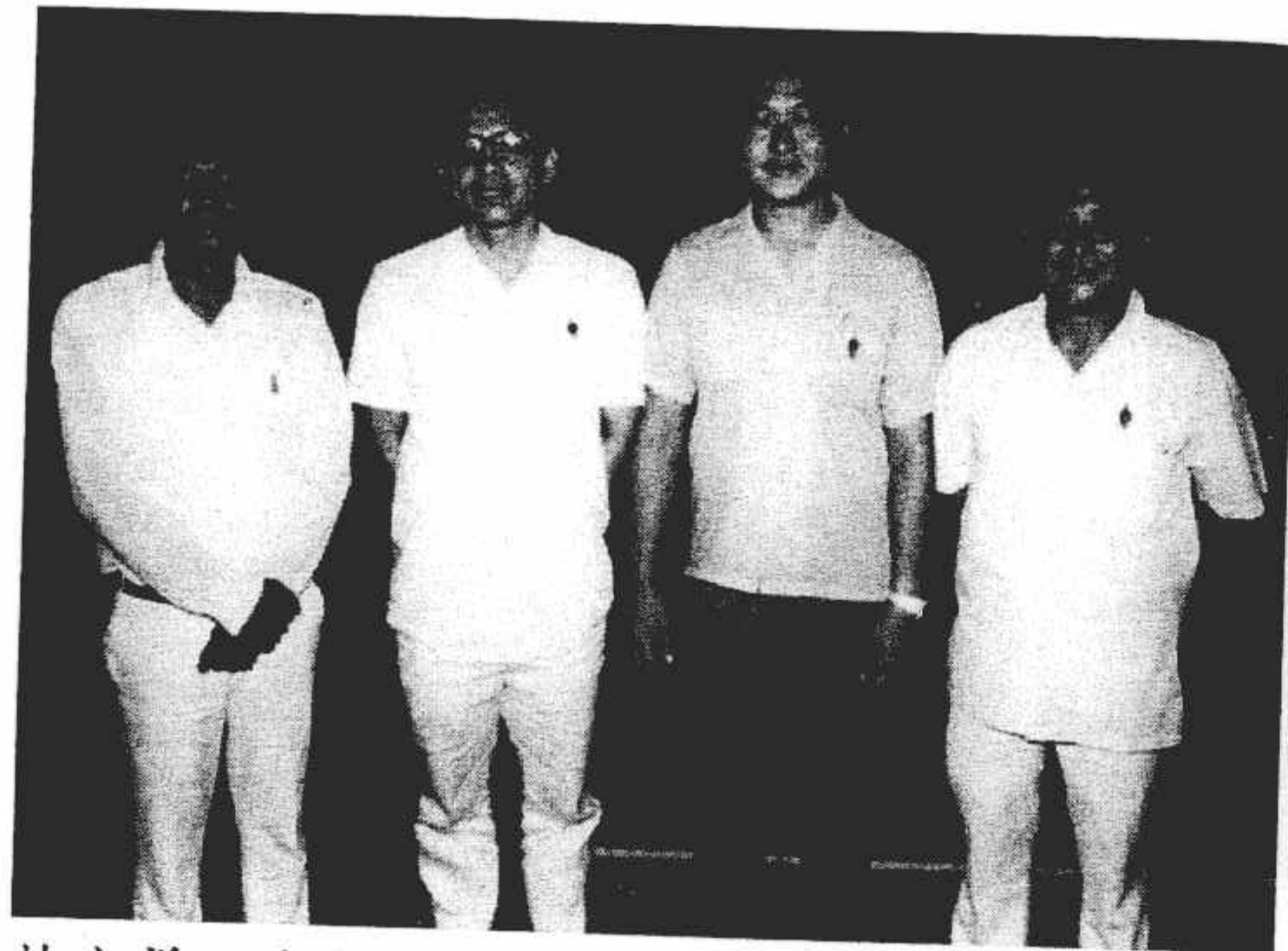
1978年大选，林吉祥和P. 巴都向选民拜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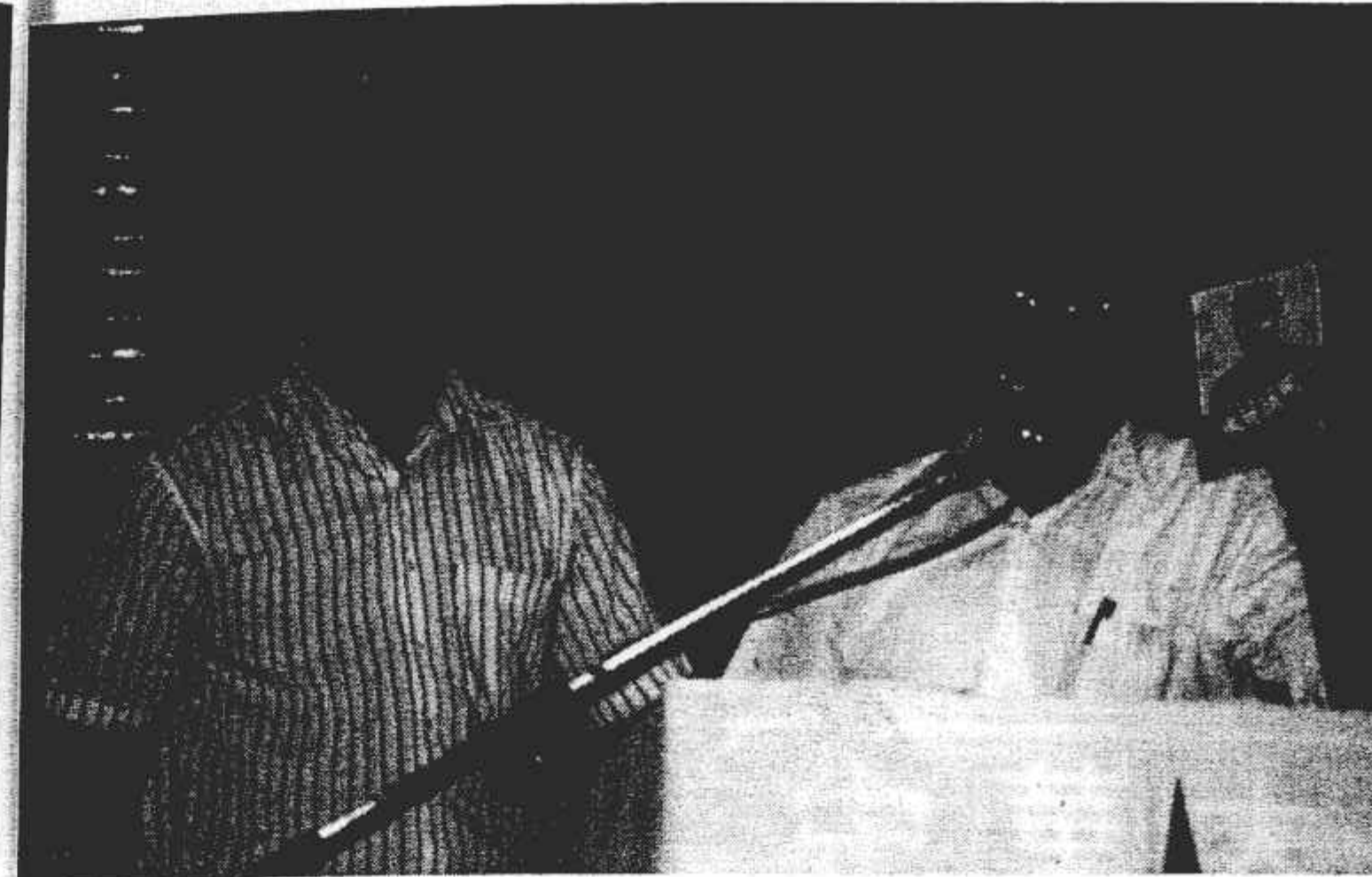
1978年9月24日，秘书长林吉祥（左四）和副秘书长林子鹤（左五）第一次访问砂拉越州。抵达古晋时，受到砂州行动党创党人陈泽坡（右三）、张守江（右二）及支持者热烈欢迎。



阿末诺，行动党著名的马来领袖之一，曾是马来西亚公务文员职工会总会主席。参加行动党前曾是社民党和马来西亚国家主义党的重要领导人。



林吉祥一手栽培的陈德泉（右二），1981年因参加“四人帮”而被开除出党，后加入马华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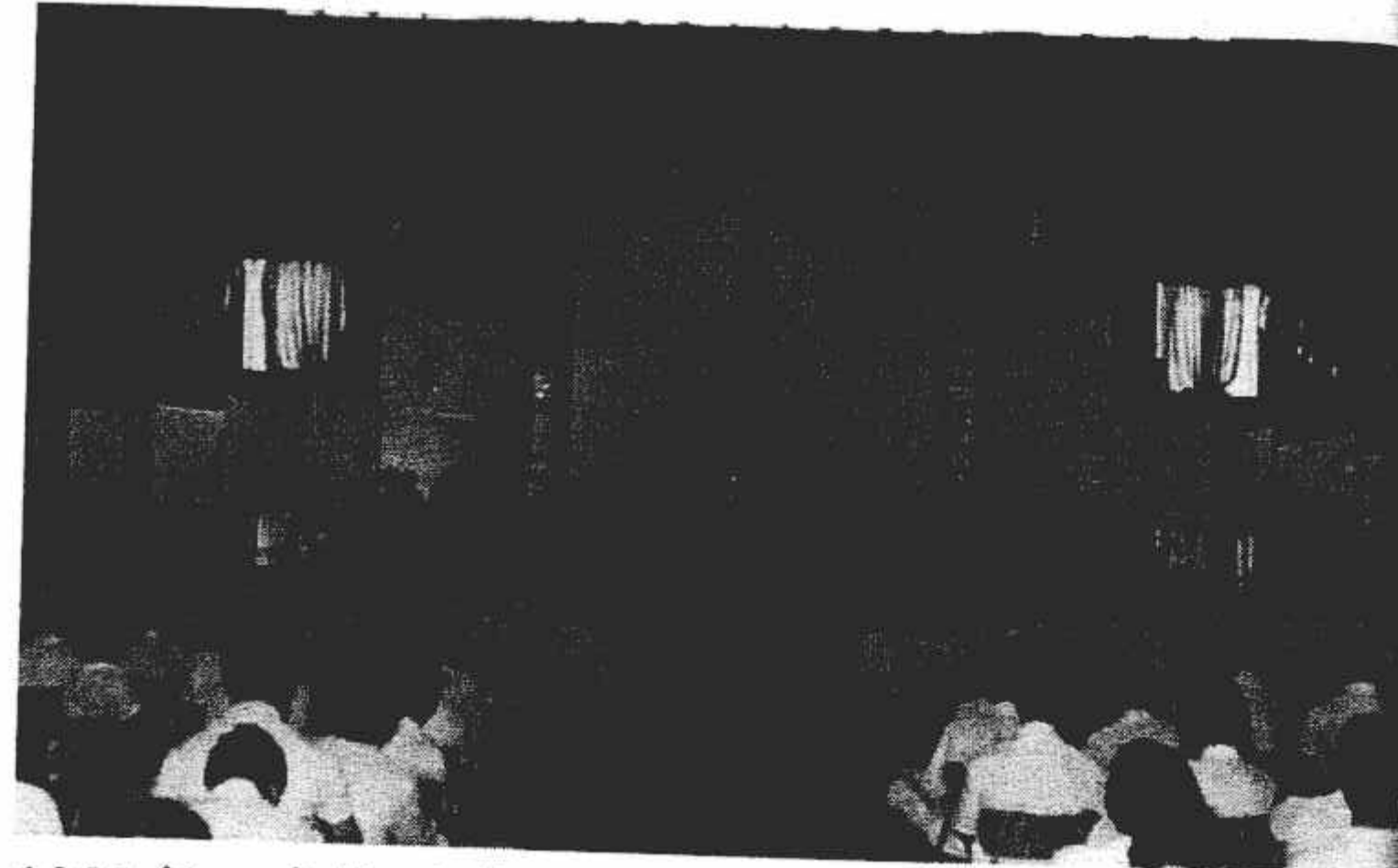
1990年大选前夕，林吉祥在全国巡回政治座谈会中，推荐笔者的政治漫画《马年论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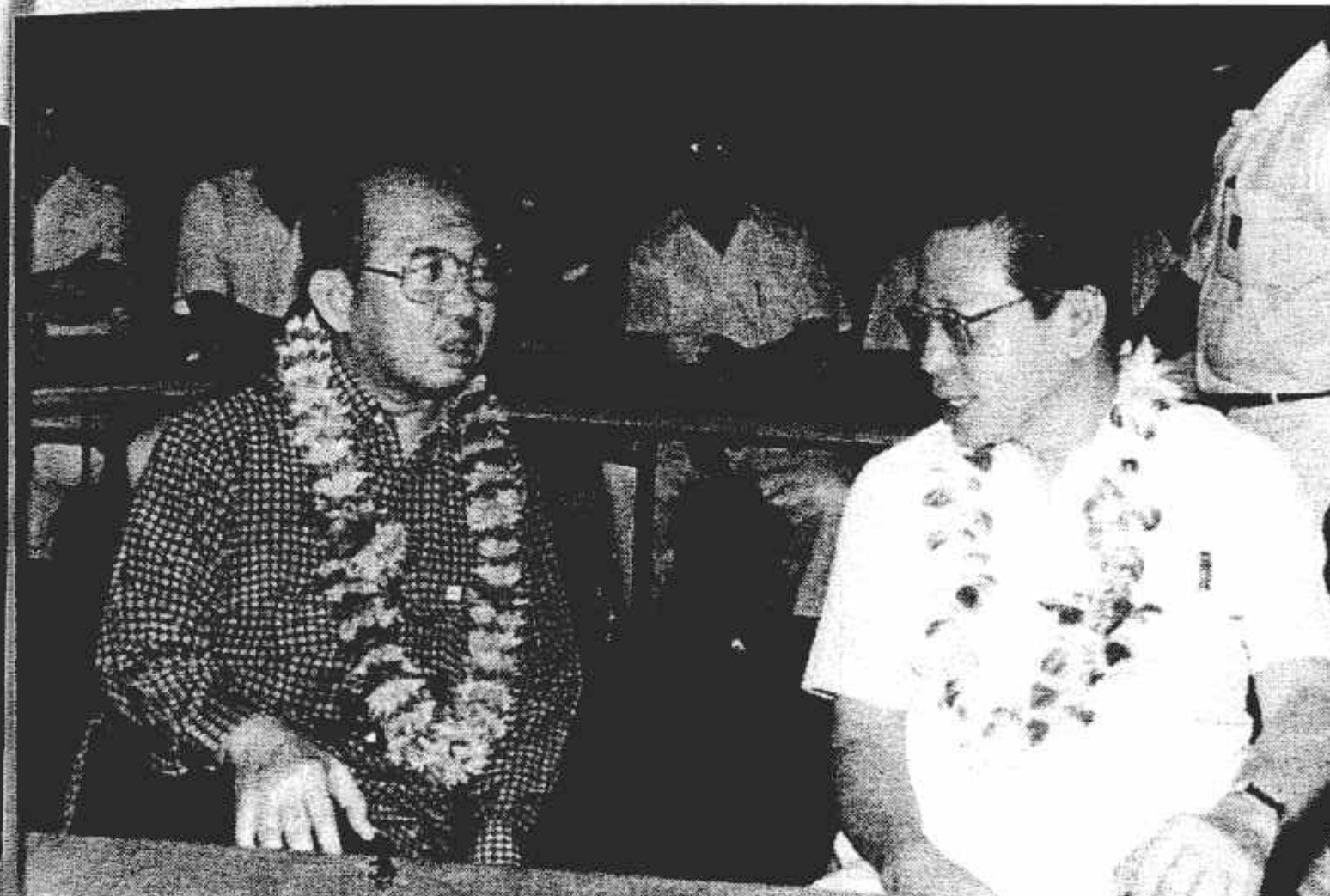
1990年10月21日晚，“丹絨第二役”的“王者之战”两巨头——林吉祥和林苍佑在计票中心等待选战成绩揭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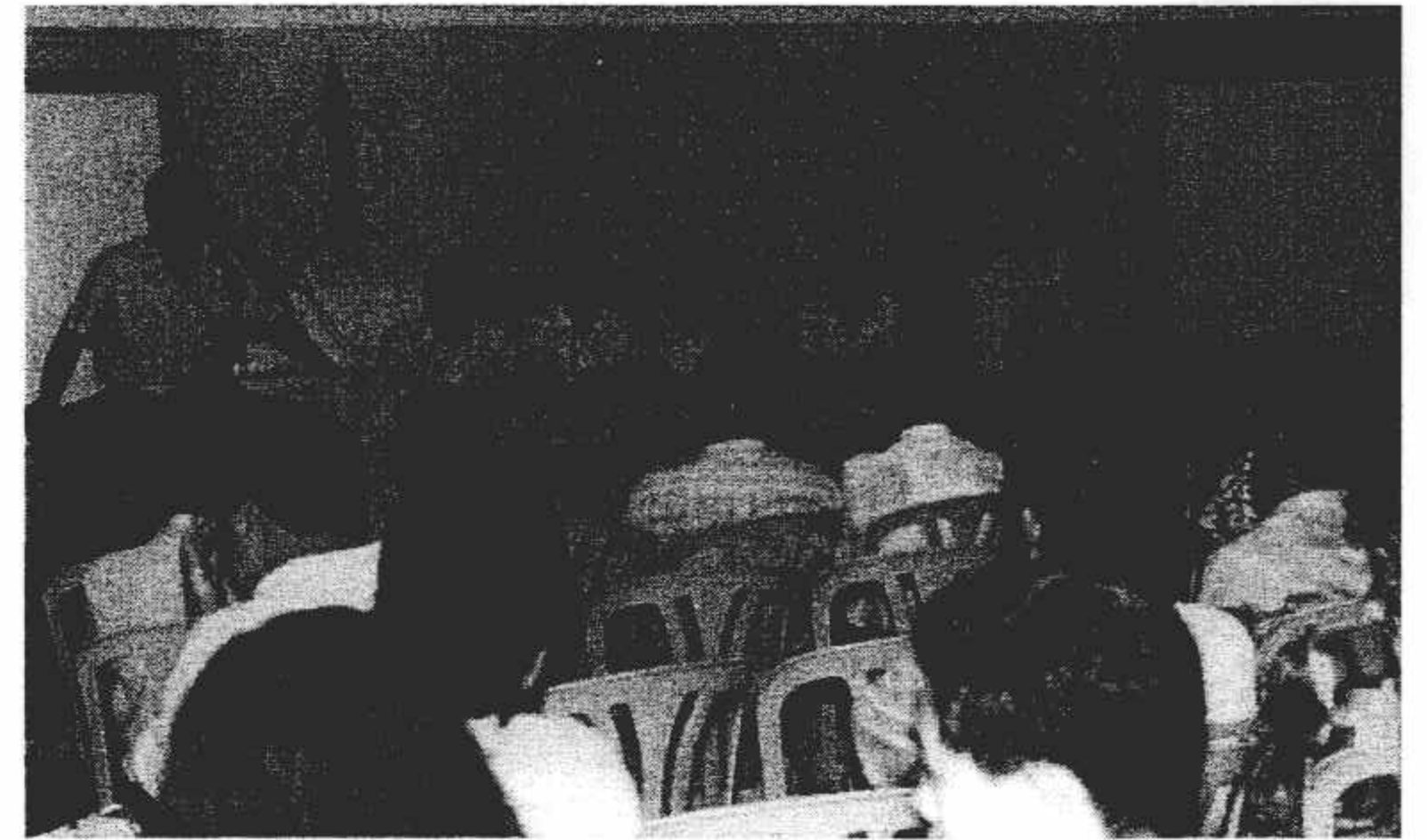
1980年12月4日晚召开的中委会，拒绝林吉祥辞去秘书长一职。这是林吉祥铲除“四人帮”的关键一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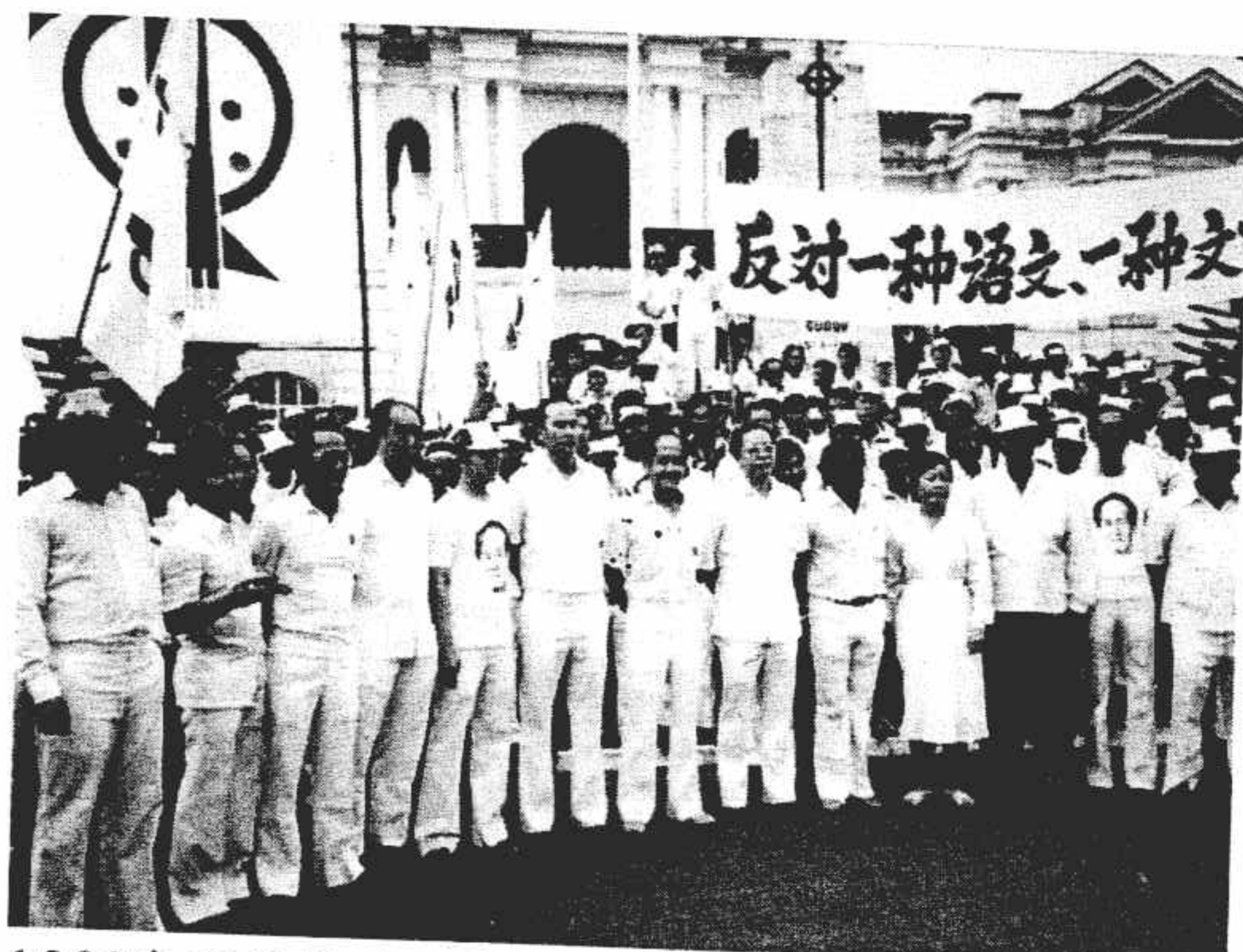
1981年，在槟州举行十五周年党庆特别大会。



1990年大选，林吉祥和46精神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在一场鼓吹两线制的政治座谈会上合影。



华团领袖柯嘉逊在入党后受委担任政治教育主任，《行动党25年奋斗史》乃由他执笔。



1983年芙蓉补选，行动党派出党主席曾敏兴医生为候选人，竞选运动猛烈抨击国阵“一种语言、一种文化”政策。



1989年5月，林吉祥在为文冬补选站台造势时，被支持者抬起的一幕。这是他自4月19日在“内安法令”下获释以后的第一场选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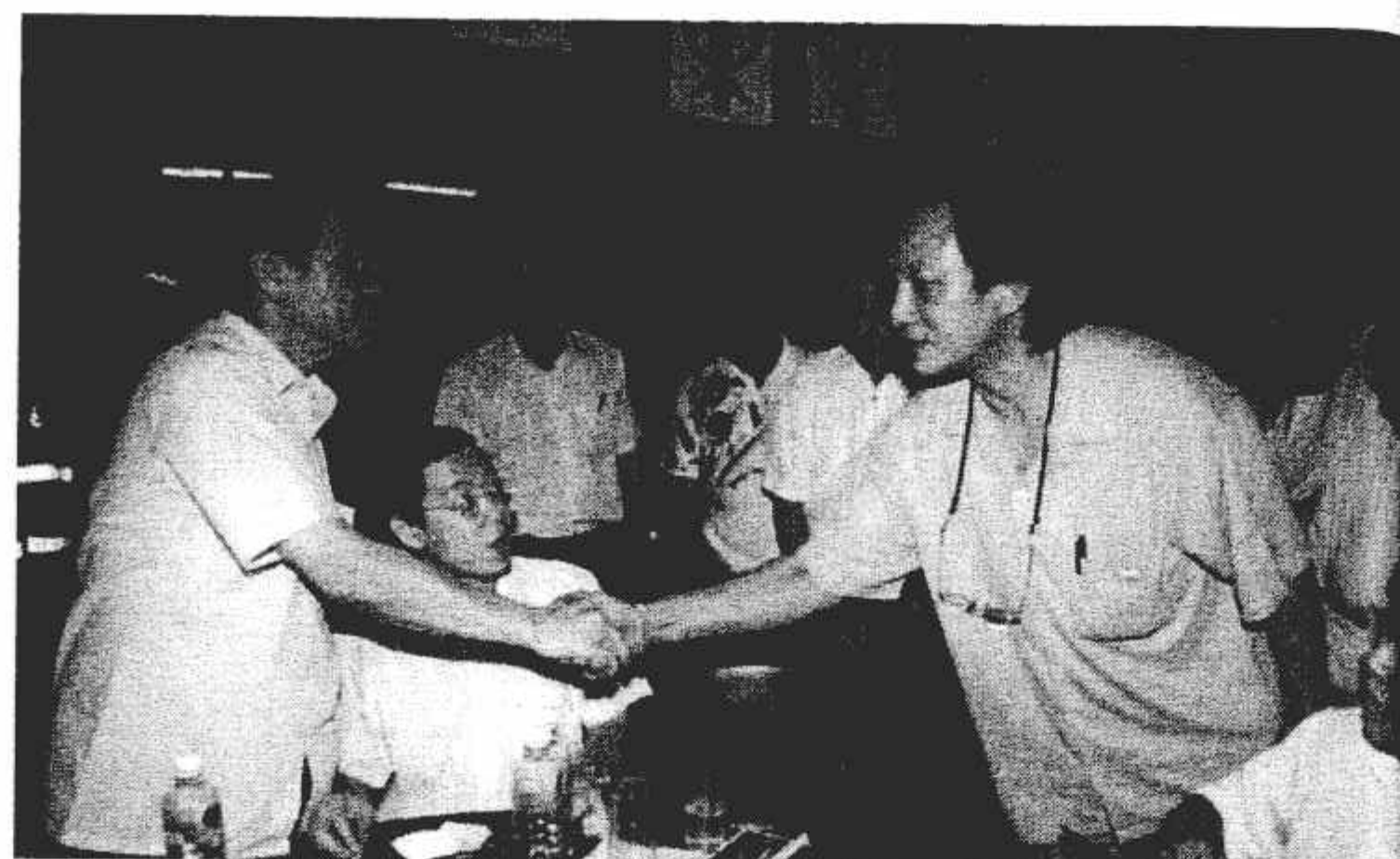
1995年7月13日，行动党领袖出席P·巴都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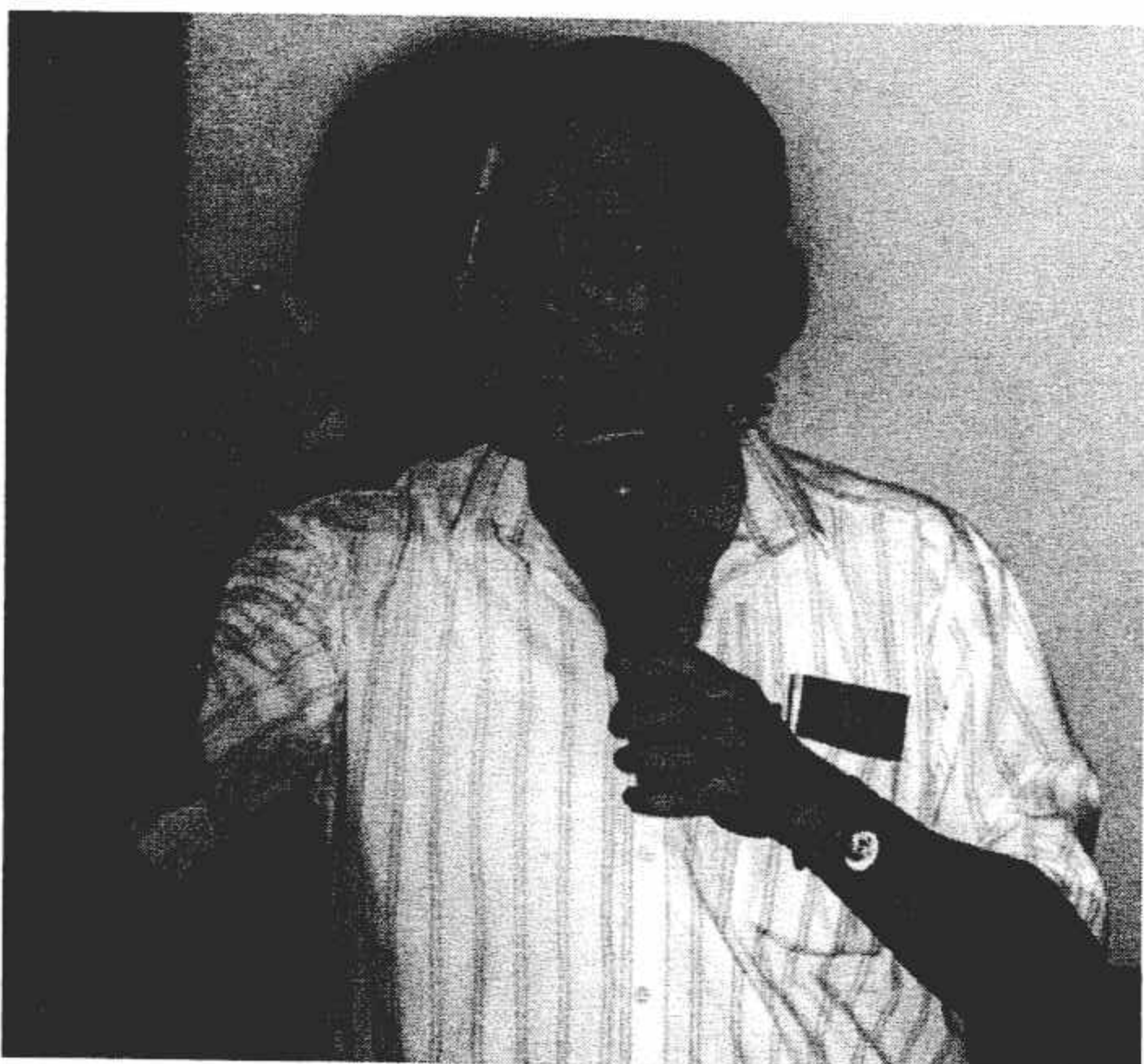
林吉祥率领槟州行动党发动“丹絨第三役”，其中一句竞选口号为“试五年”，竞选文宣的操盘手为魏福星。



1997年11月11日，行动党领袖赴印度新德里参加社会党国际理事会议，前排为日本社民党代表及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



1998年6月13日晚，黄朱强和廖金华在芦骨行动党晚宴上同林氏父子碰头，时值“倒林行动”（KOKS）进行到最高峰时段。



1998年8月17日，范俊登受林吉祥之邀，宣布重返行动党，他“希望通过和平及民主改革，建设一个新马来西亚及新世界”。



1998年8月25日，林冠英的上诉案被联邦法院驳回，这是他被送往加影监狱前同林吉祥相拥的一刻。



1998年9月上旬，安华被马哈迪革职后，同其夫人到加影锡米山行动党支部，为“争取释放林冠英马拉松绝食运动”的参加者打气。



1999年4月，林吉祥与党元老彼德·达逊（左一）及陈国杰（中）在武吉免登区的宴会上合影。他们两人生前都是林的得力助手，并且为林的中央领导权保驾护航。



1999年8月25日，林冠英刑满释放，约莫三千名反对党支持者到加影监狱外迎接，到场的马来人大大超过华人。



1999年10月24日下午三时，替代阵线四党巨头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发布“迈向一个公正的马来西亚”大选宣言。



2001年5月，笔者代表行动党赴东京参加社会党国际亚太区委员会会议，同行动党第四任秘书长郭金福访问日本社民党总部时留影。



倪可敏（左）和邓章钦（右），为行动党备受瞩目的青年领袖。

特别鸣谢民主行动党总部资料室和刘德琦先生提供相片

# 目录

- 5 自序
- 17 第一章 绪论  
(一) 前言  
(二)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三) 研究范围和重点  
(四) 文献回顾与评析  
(五) 研究路径和概念框架
- 39 第二章 马新“第三条道路”的渊源与赓续：时代背景和政治变迁  
(一) 前言  
(二) 从日军投降至英军剿共（1945年—1948年）  
(三) 从右派筹组“联盟”到迈向独立（1949年—1957年）  
(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的对峙（1955年—1964年）  
(五) 从马新合并到分家（1963年—1965年）  
(六) 民主行动党的诞生：“第三条道路”再出发
- 89 第三章 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研究  
(一) 前言  
(二) 《文良港宣言》：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  
(三) 费边社会主义取向：宪政民主、和平渐进、点滴改革  
(四)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争取各民族的权利平等  
(五) 世俗民主：反对神权政治  
(六) 小结
- 131 第四章 民主行动党的政策研究  
(一) 前言  
(二) “元政策”：超越教条和务实  
(三) “总政策”：从清晰到含混  
(四) “基本政策”：反对、监督、制衡  
(五) 小结
- 184 第五章 民主行动党的组织架构与权力运作  
(一) 前言  
(二) 党员的筛选和控制  
(三) 支部的设立与发展  
(四)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权式领导  
(五) 州委员会的权限与职责  
(六) 国会选区联委会  
(七) 遴选国州议席候选人  
(八) 组织侧翼：妇女组与青年团  
(九) 党的开支与经费来源  
(十) 小结
- 225 第六章 林吉祥治党与民主行动党的派系斗争  
(一) 前言  
(二) 林吉祥的崛起与受难  
(三) 吴福源的重返与挑战  
(四) 范俊登对林吉祥的意识形态批判  
(五) 林吉祥铲除“四人帮”  
(六) 李霖泰神秘“退出政坛”  
(七) “818华教分子”的抗议出走  
(八) “倒林运动”的始末  
(九) 中、新生代的挑战  
(十) “林氏王朝”面对的批判  
(十一) 小结
- 367 第七章 民主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一个战略和战术的分析  
(一) 前言  
(二) 开创与崛起期（1966年—1969年）  
(三) 整顿与发展期（1970年—1978年）  
(四) 成熟与高峰期（1979年—1990年）  
(五) 困惑与重创期（1991年—1999年）  
(六) 反思与复兴期（2000年迄今）  
(七) 小结
- 515 第八章 结论
- 526 参考书目与访问人物表



98	表1：马来西亚人民参与职工会在劳动力总数所占之比率
191	表2：民主行动党的普通党员和永久党员之统计数据 and 比例
193	表3：民主行动党各个民族党员之累积数据和比例
194	表4：民主行动党男女党员之累积数据和比例
198	表5：民主行动党历年新增和逐年累积之支部统计
207	表6：民主行动党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民族比例
375	表7：1969年大选西马各政党所赢得的国州议席及国会选举得票率
375	表8：1969年大选行动党在西马各州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375	表9：1969年大选西马各政党在各个州属所赢取的州议席之席次
383	表10：1974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383	表11：1974年大选行动党国会与各州议会之得票总数与得票率
383	表12：1978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会之席次
390	表13：1978年大选行动党国会与各州议会之得票总数与得票率
401	表14：1982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415	表15：1986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415	表16：1986年大选西马主要朝野政党得票张数、得票率与国会席次
432	表17：1990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433	表18：1990年大选国阵和各个主要反对党选举成绩
454	表19：1995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476	表20：1999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476	表21：1999年大选替代阵线四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比较
510	表22：2004年大选西马各主要政党表现比较
192	图1：民主行动党普通党员与永久党员之比例图（1966-2004）
207	图2：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民族比例结构变迁图
218	图3：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架构图

## （一）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欧洲十数个国家的中左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告捷，耀眼灿烂的红玫瑰瞬间开遍了全欧疆域，出现了一股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神奇回归”的时代风潮。<sup>1</sup>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曰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遂再度成为晚近西方学界研究的一项热点，迄今仍方兴未艾。然而，学界对这一股思潮的探讨，主要专注于考察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倡议的“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Die Neue Mitte）。<sup>2</sup>

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第三条道路”是试图超越欧洲传统左右对峙的“激进中间派”（radical centre）之崛起，并将之喻为“社会民主的更新”（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sup>3</sup>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指社会民主潮流是后冷战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的“趋同论”（the theory of convergence）所致。<sup>4</sup>当然，也有论者从选举谋士（Spin-Doctor）的公关运作，来解释欧美中左翼候选人靠媒体魅力所掀起之革新潮流；<sup>5</sup>亦

1. Rene Cuperus and Johannes Kandel,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Amsterdam: Ebert Foundation, 1998).
2. 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党魁对“第三条道路”的原则性陈述，请参阅Tony Blair, *The Third Way* (London: Fabian Society, 1998); Tony Blair and Gerhard Schroder, *Europe: The Third Way- die Neue Mitte* (London: Labour Party and SPD, 1999).
3.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4. 有关概念的讨论，见Simon Langlios, Theodore Caplow, eds.,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Comparing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Buffal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2.
5. 有分析指美国新民主党的选举谋士为克林顿进行的“政治包装”，是一种打媒体选战的有效策略，它后来被英国工党所借鉴，使到布莱尔在1997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这一种利用新媒体运作来吸引选民支持的选举技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也积极仿效，成为欧美选举政治重要的一环。对这一趋势的检讨，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观点，请参阅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页116-123。

有论者称这是欧洲成熟民主社会中的选民之周期性钟摆投票行为所引致的政党轮替现象。至于完全持否定态度的论者，则指一些老牌的社会民主党，在冷战结束后，乃是靠剽窃了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精髓才有能力回朝执政。<sup>6</sup>而英国新工党上台后的施政表现，也引起学界正反两面的评价，尤其是激进的新左派学者和传统的共产党人，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更是批判得体无完肤。<sup>7</sup>可以这么说，“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经已获得相当充分的讨论。<sup>8</sup>

中国大陆学界和专门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机构在这一方面亦不落人后，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从1970年代那一种纯粹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动机的研究范式，逐步过渡到1980年代以介绍欧洲个别社会民主党状况的翻译和综述性文章，进入到21世纪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较为持平和客观分析的新阶段。<sup>9</sup>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在台湾，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在2000年大选后执政的民主进步党，其领导人陈水扁更对布莱尔幕后的理论高参纪登斯之理论观点十分推崇。陈公开宣称他是从中获得启发而提出民进党的“新中间路线”。<sup>10</sup>

6. “Goldilocks Politics”, *Economist*, vol. 349, issue 8099, 19 December, 1998, p.73.

7. Stuart Hall, “The Great Moving Nowhere Show”, *Marxism Today* (Nov/Dec 1998): 9-14.

8. 对英国新工党的施政给予正反两面的剖析和批判，纪登斯进行了总结并做出回应。请参阅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London: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Anthony Giddens, *Where Now for New Labour?* (London: Fabian Society, 2002).

9. 中国大陆学界近年来比较具代表性的著作，计有陈林、侯玉兰：《激进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现象审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王学东等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李宏：《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裘援平、柴尚金及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

10. 陈水扁：〈序：前进“第三条路”·迎接廿一世纪〉，见马永成、陈其迈译，布莱尔著：《颠覆左右：新世代的第三条路》（台北：时报出版，1999年），页6；同氏：《台湾之子：我的成长经历、经营哲学和国家愿景》（台北：晨星出版社，1999年）。

作为一支发端于欧洲工人运动，标榜既批判资本主义，也不认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已经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sup>11</sup>并且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依循议会民主的道路，展开了追求进步、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议程。作为该思潮发源地的欧洲，不论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崛起的“黄金时期”，抑或冷战后“社会民主之更新”，均获得相当瞩目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学界对于欧洲范围以外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以来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即使是在上世纪末属于亚洲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社会党（后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学界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当然东南亚区域的其中一个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的“第三条道路”，更可以说完全未曾引起学界的注意。<sup>12</sup>

##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四大文明交汇的多元民族国家，独立后的政体为“君主立宪”的英袭议会两院制。在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权长期强悍统治的国度里，左翼宪制反对派，特别是因获得大多数非马来人支持而崛起的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下简称行动党），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和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有什么异同点？它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社会里又面对哪些困难和挑战？它对马来西亚的国家建构发挥过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论文关心的核心议题。

其实在1966年行动党建党之前，1950年代的马来亚也曾经出现走

11. 根据社会党国际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直至2003年10月它在巴西召开第廿二大为止，全球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政党和组织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遍布世界五大洲的一百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力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

12. 学界在冷战期间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民族主义执政党——巫统的动向。随着马共的式微，冷战的结束，巫统及其主导的国阵（包括其领导人）更成为考察的重点。“安华事件”和“9·11事件”爆发后，因应国际和区域反恐的需要，崛起的回教党遂引起学界关注。至于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研究，一直有重历史、轻现状之势。以华人为基础的宪政左翼反对党，依然还是马来西亚政治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

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马来亚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 of Malaya），它在1952年创立，1966年被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开除，<sup>13</sup>1972年宣告解散。劳工党从最初的亲殖反共，逐渐蜕变成为反殖亲共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最后因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转型为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极左翼政党。1967年后，劳工党在华文教育派极左分子的主导下，回过头来批判社会民主主义，鄙视议会民主路线，甚至有少部分的党员直接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南下突击队的游击战斗。<sup>14</sup>劳工党廿年的斗争，正值马来亚独立建国初年。以巫人全国统一机构（UMNO，下简称巫统）为主干的联盟政府，因遵循冷战反共的国际战略，对于劳工党所开展的“反帝、反殖、反封建、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路线”给予强力的镇压，导致劳工党的组织力量受到致命的打击。外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激起该党强硬路线的抬头，造成温和的费边主义派系受到激进毛派的批判。劳工党在“纠正右倾”的内斗过程中，甚至采取了盲动冒进的步伐，夸大群众斗争的作用，终于作出杯葛1969年大选的错误决定。<sup>15</sup>选举后的第三天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暴动——“5·13事件”，马来西亚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议会民主停止运作将近两年。而巫统的激进派则趁“5·13事件”引发了一场“准政变”，推翻了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尔后由敦·拉萨（Tun Abdul Razak）接任首相，并将联盟扩大为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下简称国阵），收编了其他反对党，调整了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方针，推出了廿年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

13. 马来亚劳工党被社会党国际开除的原因，主要是该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劳工党九成被共产党渗透，同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无异。此外，它的宣传与共产党的宣传亦无法区别。”引自Alex Josey, *Asia Pacific Socialis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3), p.18.

14. 陈松沾：〈浅谈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发表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会之大会论文（吉隆坡：星洲日报2001年12月6日）〈<http://soc.sinchew-i.com/special/seachinese/>〉。

15.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秘书处：〈坚决抵制伪“大选”，打倒美英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拉、李反动集团〉，见朱齐英：《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年），页677-83。

（1970—1990）。

前身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的民主行动党，建党于1966年3月18日。1965年，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因在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政见上严重分歧而导致新马分家。人民行动党遗留在西马半岛的领袖和党员，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而重新注册为民主行动党。该党一方面被右派的巫统视为延续李光耀挑战马来人特权的新加坡代理政党，另一方面则被极左派的劳工党，视为“英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儿子”，并被扣上“反动、冒充的左翼政党”及“人民行动党化身的机会主义者”等帽子。1969年大选后，行动党崛起成为代替劳工党在马来西亚作为合法左翼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廿年期间，行动党严守岗位，成为国会内坚持不参加国阵的在野党。除了1999年的大选，1969年至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一直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中的最大反对党。卅载以来，行动党对于监督和制衡国阵政权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特别是在反对民族同化、揭露政府弊案、促进社会开放和守护公民自由权方面，行动党的角色不容抹杀。

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行动党坚持要求三大民族权利和义务平等，反对巫统“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种族主义路线，虽深获城市和新村中下阶层华裔选民的支持，但这个主张打破种族樊篱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纲领，却吊诡地成为行动党在华人社会画地为牢的政治符号。

就理论概括而言，从196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代初，行动党和巫统的政治角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来西亚国民“身份认同”

（National Identity）的政治论述的竞争，盖双方对独立建国后的“民族主义”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属于右翼的巫统，以强悍的马来民族主义和后殖民论述，将人民行动党延续到民主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论述，当作是英殖民主义者蓄意扶持新马华人的精英分子，以用作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个外来意识形态（an alien ideology）。另一方面，以华人为主的激进劳工党（受中共和马共影响），联同马来左翼的人民党（PRM，受印尼苏卡诺影响）筹组了社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 下简称社阵), 它们誓言要“解散马来西亚”, 以拒绝西方新殖民主义继续钳制一个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故此,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被社阵看成是行动党蓄意突出民族矛盾来转移阶级矛盾的机会主义论述, 用来证成极左派对社会民主主义投降路线的批判。所以, 行动党在建党初年, 就是处于“联盟政府的种族性右派”和“受外国鼓舞的反马来西亚的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sup>16</sup> 这一个意识形态论述的对峙, 来自右翼方面一直保留至今, 但来自左翼方面, 随着马共没落, 社阵解散, 劳工党注册被吊销, 人民党晚期并入国民公正党 (KeADILan), 其论述才出现新的变化。

1999年大选, 因“安华事件”的冲击, 马来社会出现空前严重的分裂, 泛马回教党 (PAS) 伺机吸纳了反对马哈迪的马来选票, 瞬间崛起并取代行动党, 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而行动党、回教党、公正党及人民党在1999年大选前所缔结的替代阵线 (Barisan Alternatif, 下简称替阵), 在选举后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回教党强硬的原教旨主义施政 (该党执掌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政权), 让坚持世俗民主的行动党, 面对非回教徒社会时十分尴尬, 最终导致行动党退出替阵。“9·11事件”的爆发, 更加速了回教党的激进姿态, 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开始进入回教党和巫统之间“回教国模式”和“回教化政策”竞争的新保守时代。<sup>17</sup> 进入21世纪的行动党, 遂定位在既不认同巫统的马来种族主义, 也不支持回教党神权政治的“第三条道路”。而公正党和人民党则在替阵内延续了早年社阵对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批判, 指行动党蓄意突出“世俗民主”是要转移人民反对国阵霸权的视线, 甚至指责行动党在“9·11事件”爆发后退出替阵, 是机会主义作祟, 破坏了替阵团结, 间接协助巫统在2004年大选收复失地。

由是观之, 行动党的“第三条道路”从昔日被华、巫左右派围剿, 发展到今天被马来民族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夹击, 都是因为民

16. 〈文良港宣言〉,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八打灵再也: 民主行动党, 1993年), 页161-2。

17. 林吉祥: 《不要929》(吉隆坡: 民主行动党中央宣传局, 2002年), 页1-3; 11-12。

族、文化和宗教论述遮蔽了阶级、世俗和民主主义的论述, 这不仅与欧洲古典的“第三条道路”面对左翼共产党人和右翼保守主义者夹击的政治处境有所不同; 也和纪登斯晚近所提倡“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中间偏左” (left of centre) 的路线有明显区别。故有论者认为, “第三条道路”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上是不能成题的, 因为自“5·13事件”后, 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只是在种族问题上争论不休, 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左右对峙。加上1989年马共宣告结束武装斗争, 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的分野, 所以“第三条道路”在马来西亚不仅无法定位, 即使从西方引荐进来, 也会“水土不服”。<sup>18</sup>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现实状况, 肯定会孕育出不同的“左派”, 会因应不同的政治需求而进行不同的现代化反思。况且, 属于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向来都没有将某一意识形态僵化地定于一尊, 以作为其他政党实践的绝对标准。所以, 英国新工党的反思和再造, 只能作为其他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参考实例, 而不是唯一遵照的道路和模型。鉴于此, 纪登斯在2003年, 也决定将“第三条道路”扩大成更具包容性的概念, 他称之为“新进步主义” (Neoprogressivism), 以纠正“第三条道路”被世人狭隘地标签为盎克鲁·萨克逊 (Anglo-Saxon) 式新左派之政治分析和政策决定。<sup>19</sup>

香港左翼理论家鲁凡之曾指,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在东方两个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之一;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民主党。前者也是现在举世唯一华人为主的具较大影响力的社会党类型政党”。<sup>20</sup> 换言之, 行动党作为社会党国际在亚洲的资深成员党, 它三十八年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肯定具有独特的马来西亚色彩, 甚至包括海外华人的色彩。而这又和马来西亚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

18. 潘永强: 〈第三条路的教战手册〉, 见《星洲广场》, 2001年9月9日。

19. 有关“新进步主义”的讨论, 请参阅Anthony Giddens ed, *The Progressive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之绪论部分。

20. 鲁凡之: 〈南洋华人——第三条路——李光耀〉, 见香港《明报》, 2000年12月19日。

文化息息相关。所以，马来西亚的“左派”和“右派”，必然与欧洲意义的“左派”和“右派”有所不同，且这个国家的“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比欧洲壁垒分明的左右两派还要复杂得多。因此，要界定一条马来西亚独特的“第三条道路”，不仅需要超越传统的左与右，还要兼顾世俗和神权、阶级和民族、同化和融合这些巨大的矛盾。

在纪登斯的领头下，学界目前正继续关注“第三条道路”和全球化问题，并企图把二者综合起来，展开“全球第三条道路辩论”（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sup>21</sup>有关辩论大体上可分作南北两派，一是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中左翼学者，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将“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提升到民族国家以上的层次，贯彻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框架中；<sup>22</sup>二是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他们重视的反而是在相对落后的本土条件下，如何在亚、非、拉的民族国家里，实践一个具有普世进步意义的社会民主价值观。<sup>23</sup>诚然，迄今对“全球第三条道路辩论”还是以北派研究的文献居多。本论文将从南派的角度出发，以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作为分析单位，以试图丰富学界就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来可克服北派研究有“欧洲中心论”之嫌，二来亦能为“新进步主义”的概念添砖加瓦。故此，在“全球”及“本土”两个互动框架下对行动党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均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 （三）研究范围和重点

本论文以行动党中央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尤其侧重于分析行动

21. Anthony Giddens ed.,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黄瑞祺：〈纪登斯现象〉，见纪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页xv。
22. David Held, "Global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Progressive Manifesto*,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p. 137-172.
23.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The New Left Viewed from the South", in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p. 358-371.

党在西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对于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两州，以及对该党的次级单位如州委员会、妇女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着墨不多。本论文总共分成八章，最后一章为结论，其余七章的研究范围主要如下：

第一章探讨研究行动党的理论意义、文献回顾和概念框架。

第二章主要是追溯行动党在建党之前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从二战后马新左右翼对争取国家独立和建构民族认同的脉络中，来理解马来亚共产党人、民主社会主义者及马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角力。这些历史宿怨和意识形态分歧，决定了马新分家后，遗留在西马来半岛的行动党人日后赓续“第三条道路”的斗争时，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换言之，不认识这一段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就无法理解1960年代后期行动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坐标。

第三章则专注讨论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渊源、特征、发展和修正。它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是研究自欧洲工运分裂所发展出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东南亚民主发展滞后的国度里，历经了哪一些修正和调整，又信守了什么原则和价值，才能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行动党的《文良港宣言》和林吉祥对马来西亚民主社会主义的诠释，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文本。再来是分析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迂回路线”及“宪政民主”如何影响行动党的政治纲领和日常实践；接着是剖析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诉求，对建构一个“国家民族”（state-nation）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在挑战巫统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和马哈迪的“马来西亚族”时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最后是考察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回教化国策的洪流中坚持“世俗民主”的重要意义。行动党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里捍卫“政教分离”、“现代性”和“多元主义”，注定了连最开明的马来知识分子都视其为“世俗原教旨主义”。从行动党参加替阵到最后选择孤军奋战，在在突显它在守护非回教徒国人的宪赋权利与争取马来人支持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第四章进入对行动党政策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元政策”、“总政策”和“基本政策”三方面来分析。在“基本政策”的

范畴内，可按具体内容再划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族裔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及“国际民主”六大领域。这有助于理解一个威权国家里的左翼反对党，其政策的制定和提出、修正和翻新、被认可和被拒绝，对长年执政的国阵政府到底发挥什么影响，以及对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之民主化和现代化产生什么作用。本章也将行动党的政策内容对照英国“社会民主之更新”，提出了新的发现和见解。

第五章是分析行动党的组织架构与权力运作，它是从“政党作为组织”（parties as organizations）来着手研究，关注的是“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而非“竞选动力”（electoral dynamics）。对于“组织动力”，笔者借鉴了著名的德裔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iron law of oligarchy）作为参照系，考察了行动党的组织架构、决策核心、权力运作、经费来源、党纪维护和基层党员的构成等等，采取的研究路径基本是从内环出发（internalist approaches）。此外，笔者亦透过行动党组织部电脑所运算出来的第一手数据，勾勒出行动党从1966年到2003年的党员成分，这是前人研究所不曾取得的成果。

第六章是以行动党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为脉络，来探究该党的灵魂人物林吉祥到底是如何从党内崛起、如何晋升领导核心、如何巩固权力、如何排除挑战者，又如何培植儿子林冠英接班，以致让人普遍抱有“林吉祥就是行动党”及“行动党就是林氏王朝”的刻板印象。本章特此选择了七宗派系个案，从中观察林吉祥对权力的行使、对领导地位的巩固及对党内决策的影响，以试图理解一个长年居于第一把交椅的党魁，是怎样领导一个长年同执政无缘的在野党。笔者期望透过解释林吉祥的派系行为，分析林吉祥的治党手法，能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林吉祥对行动党和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的功过。

第七章是分析和叙述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笔者透过观察该党曾参加过九届全国大选和一些比较重要的补选，来剖析它所应用的选举战略和战术。简言之，“将政治带回来”，是为避免低估政治行动者进行战略和战术选择的可能性，也让后人不能完全将政治改革的

滞后归咎于结构遏制的“宿命论”。本篇引用了行动党大量的原始资料，如该党领袖平日应对政敌的文告、演讲和国会演词，该党在临近大选前的形势分析，竞选拉票期间分发给选民的文宣品，以及大选过后该党的检讨报告等等。再者，笔者亦援引当局所公布的选举数据，以及参考报章和学界的评论，来再现每一场重要选战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笔者认为，以叙事的手法，辅以必要的分析，才能最有效地道明战略和战术的应用，如何让“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限来突破“结构的制约”。本章是“议会斗争史”而非“选举史”研究，更不是政治学专业的“选举研究”（election studies）。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第六和第七章对比其他章节的篇幅要大得多，这是跟研究的重点息息相关的。如林吉祥担任行动党秘书长一职长达三十年，许多重大的派系斗争个案林都涉及其中，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只有充分利用所发掘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能说明林吉祥治党是如何影响了行动党的党内民主和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历程。第七章则处理行动党三十八年来的宪制斗争史，作为社会民主党研究，议会道路而非武装斗争可谓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且每一届选举都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变迁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笔者试图从掌握的大量原始素材，铺排出一个较清晰的历史画面，来说明朝野政党是如何发挥战略和战术来竞逐权力。换句话说，这两大环节的研究，确实需要依赖大量原始资料才能充分说明问题。

#### （四）文献回顾与评析

新加坡学者何启良曾说：“对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分析和研究，在马来西亚或国外，皆一直缺乏有系统的整理，除了少数学者的著作之外，大部分的分析工作都落在大众媒介的肩膀上。总的来说，我们对大马政治反对势力的了解，只能算是初步而已。”<sup>24</sup>

24. 何启良：〈政治反对在大马——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见何氏编著：《当代大马华人的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年），页69-80。

首先，撰写行动党课题的非学术著作，计有描述行动党派系斗争的《行动党大风暴》<sup>25</sup>和叶锦源的《行动党的丹絨三役》。<sup>26</sup>这类文献的撰写动机，是为挖掘行动党派系之间的所谓“内幕消息”，真知灼见和恶意谩骂交织在一起。它们作为洞悉该党内部运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为严格的学术考察则不能入格。在同类文献中比较引起学界关注的著作，为行动党的前政治教育局主任柯嘉逊博士所出版的《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1990-1995》。<sup>27</sup>该书披露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林吉祥的威权领导及该党的派系斗争作一个清算式的批判，可谓一个激进左派的文本。柯书对往后英语学界判断行动党之路线和林吉祥的领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John Hilley的《马来西亚：马哈迪主义、霸权与新反对派》一书，对于行动党部分的政治分析，就几乎全盘采纳柯氏的意见，<sup>28</sup>这构成John Hilley对于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反对马哈迪“文化霸权”的预测方面，贬低了行动党的作用，反而以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及新社会运动的经验出发，夸大了它们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影响力和草根组织的动员能力。

间接论及到行动党的学术著作，在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内，属于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进路的文献，较具代表性的有Hua Wu Yin在1980年代出版的《马来西亚的阶级与种族主义：在一个依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该著作使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来解释马来（西）亚在战后的新殖民地社会中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焦点虽是批判中心和边陲的资本主义之剥削性，但他也责备“行动党是一个延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机会主义地拥护非马来人之权益而煽动种族主义火焰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sup>29</sup>然而，通盘阅览Hua的论述，

25. 周少龙、江振旋编撰：《大风暴——民主行动党的危机》（吉隆坡：出版社不详，1980年）。内容主要是挖掘行动党在1981年初，因一场补选的失利，而引发所谓秘书长林吉祥支持英文教育源流的领袖、排挤党内华文教育派领袖的内幕。

26. 叶锦源：《行动党的丹絨三役》（檳城：叶锦源自资出版，1995年）。

27. Kua Kia Soong, *Inside the DAP* (1990-1995), (Kuala Lumpur: Kua Kia Soong, 1995).

28. John Hilley, *Malaysia: Mahathirism, Hegemony and the New Opposition* (London: Zed Books, 2001), pp. 234-36.

29.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London: Zed Books, 1983), p.135, 148.

他对行动党的定性分析却没有建基在具体事实上，且有不少牵强附会及自相矛盾之处。Hua的研究进路，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样，旨在寻找马来西亚族群矛盾背后的阶级利益和国家介入。这虽然是一种新尝试，但是笔者以为，左翼学界有“泛化阶级解释一切问题”的毛病，导致他们的研究对族群问题的目障。至于就具体问题的分析，Hua和John Hilley对行动党的观察，主要是依据英文材料，但是英文报章在马来西亚长期受到执政当局严控，导致讯息量十分之少。中文报刊对行动党问题的报道和评析，几乎完全不曾被以上左翼学者引用。这无疑削弱了他们对史实状况的理解，在判断问题时加重了对西方激进左翼范型的依赖。

此外，因在政治坐标上较社会民主主义更加激进而对行动党采取批判的文献，也散见在向往公正党所鼓吹的激进街头路线的学运分子和少数新闻从业员所主持的小众刊物和网站中。如黄永安的《行动党在世代更新的联系迷失》就是典型以宗派主义出发的观点。<sup>30</sup>这一类文献，它们没有固定理论，从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都有，可以作为理解“安华事件”爆发后，极少数的所谓“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对本土激进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参照点。至于要洞悉马来西亚的“老左派”，即当年劳工党的华文教育激进分子指责民主行动党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孪生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恩怨，间接的文献（如涉及李光耀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斗争）有李光耀的回忆录（上册）《新加坡的故事》、<sup>31</sup>Alex Josey撰写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sup>32</sup>及民主行动党第一任秘书长蒂凡·那（Devan Nair）为人民行动党威权政治辩护而编辑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道路》。<sup>33</sup>当然，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所编著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

30. James Wong, "DAP's Missing Link in Generational Renewal" in *Analysis Malaysia*, issue 14, 2001.

31. 李光耀：《新加坡的故事》（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

32. Alex Josey, Lee Kuan Yew: *The Struggle For Singapore* (Singapore: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0).

33. Devan Nair, *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6).

史》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sup>34</sup>

另一方面，采取自由民主进路（liberal democracy approach）或多元主义进路（pluralist）的研究者，他们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出发，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民主运作、政党政治、族群矛盾、政治精英、行政官僚、国家机关、公民社会、政治动员及对历届选举结果。不论是在纵向或横向方面，这些研究都难免会触及对最大反对党——行动党角色的考察。基于文献数量相当庞大，那些只是描述行动党背景资料的文献，就不在此评论。笔者只评析聚焦在研究行动党的文献，如在英文学界方面，开创研究行动党先河的是Michael Ong的《民主行动党：重申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一个个案》<sup>35</sup>及《民主行动党与1978年大选》。<sup>36</sup>Michael Ong的研究，主要是专注在考察1960和70年代的行动党，如对于该党参加1978年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就有十分细致的观察，同时也确实道出了行动党的结构性缺陷——无法吸引马来人的支持。而其研究缺点是没有参考华文报刊的材料，这是作者语言背景的限制所致，导致无法更细致的观察行动党的运作及它在华人社会的影响。1970年，马来亚大学学生Chin Fook Kiang的毕业论文《对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大选的分析》<sup>37</sup>只是对行动党参加1969年大选的背景描述，称不上是深入的研究分析。Chew Huat Hock的《民主行动党在后1969年的马来西亚政治：一个坚决反对党的策略》，<sup>38</sup>则分析了“5·13事件”后行动党所面对的艰辛考验。

34. 朱齐英：《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年）。

35. Michael Ong,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of Malaysia: The Case for a Malaysian Malaysia Restated*, M.A. Thesis, La Trobe University, 1969.

36. Michael Ong,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and the 1978 General Election", in *Malaysian Politics and the 1978 Election*, edited by Harold Crouch, Lee Kam Hing and Michael Ong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7-75.

37. Chin Fook Kiang, *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the 1969 General Election*, Graduation Exercis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0.

38. Chew Huat Hock,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Post-1969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trategy of a Determined Opposition*, M. A. Thesi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Statish Kumar的《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1969-1978》<sup>39</sup>及Lee Kam Hing的《马来半岛华人政治的三种道路：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等研究，主要都是论述1980年代以前的行动党活动，关注重点是行动党和其他两个国阵华（人）基（础）成员党之间的竞争。<sup>40</sup>值得一提的是，Khong Kim Hoong的《马来西亚1990年大选：延续性、变迁和种族政治》，将行动党所获得的支持，总结出五大原因，即行动党依靠的是“失望”和“反建制”的选票、反对同化的非马来人社群、社会流动受到政府政策阻碍的下层阶级、争取廉政和公信力及反对政府过度的回教化政策。<sup>41</sup>除了Michael Ong，前述文献都是依靠报章上的公开材料来研究，对于理解行动党内部的真正运作，无疑有一定的局限。

祝家华的《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sup>42</sup>及何启良的《政治反对在大马——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sup>43</sup>算是马来西亚华文学界自由民主进路阵营中的佼佼者。两人的研究，在核心环节上均论证了行动党的政治路线及林吉祥个人的奋斗在推进马来西亚民主化方面的贡献和局限。祝家华认为，“林吉祥可归为马来西亚政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更确实地说，他是独立后政治反对运动的先驱者，没有林的出现，马来西亚政治反对运动将黯然失色”。而何启良的观察，“在要与国阵政府作政治抗衡，和要达成使国家建基于‘非种族主义’的实质目标这两项前提下……这种抗衡必定导致种族政治的矛盾，而非

39. Statish Kumar,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Malaysian Political Scenario: 1966-1978*. B.A. Academic Exercise o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8/79.

40. Lee Kam Hing, "Three Approach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s: the MCA, the DAP, and the Gerakan",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edited by Zakaria Haji Ahme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1-93.

41. Khong Kim Hoong,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p. 37-39.

42. 祝家华：〈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见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页279-313。

43. 何启良：〈政治反对在大马——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页69-80。



阶级政治的矛盾”。<sup>44</sup>由此可见，采用自由民主进路的中文研究者，会比采取新马克思主义路径的英文研究者更能看清行动党的处境，这不仅是华文材料运用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自由民主进路高度关注的是战后马来西亚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变项，以及这些变项对政治反对派的制约。比如何启良对阶级分析在多元民族国家的适用性就提出了置疑。笔者以为，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解释，若泛化地套在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像马来西亚那样政治民主化不彰，民族问题纠缠不清的社会时未必就一定有效。然而，自由民主的研究范式，却有一个方法学上的短处，就是不甚重视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考察，而这恰恰是研究任何左翼政党所不能避开的重要环节。故此，笔者主张，在自由民主进路和新马克思主义路径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解释，才是透彻认识行动党所开展的政治反对运动的关键之匙。

除了政治学界有左右两支队伍，历史学界、人类学界及国际工运界也投入许多心力，以科际整合的手法，来对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问题、战后东南亚/马来西亚的民主化问题、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这些文献，其中有不少涉及行动党背景的综述，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对行动党加以“深描”，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文献的最大价值，在于协助我们理解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内一个多元民族国家里的非马来人（特别是华人），在以马来人主导的政权之高压统治下，数十年来如何进行反对民族同化和阶级压迫的政治抗争运动。只有将行动党放在这个具体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中，才能发现及省思“第三条道路”是如何竭尽所能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以及它所面对种种不利的结构性制约。

作为奉行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平斗争的关键乃是平日做好理念、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所以，行动党卅多年来的许多出版品，如四种语文的党机关报——《火箭报》（The Rocket）、党中

44. 同前书，页73。

央宣传局的大量文宣册子、历届大选的竞选宣言、个别领袖的政治文集、国会及州议会议员的演讲稿件、行动党网站所发布的讯息，加上各大语文报章（包括后期的电子报）和杂志的报导，这些公开的庞大讯息量，都是研究行动党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只供内部流传的文献，如历届党员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纪录、党中央辖下各个局、委员会、小组的工作报告、选举后的党内检讨分析，以及纪律委员会的信函等等，这些外界所无法接触到的内部档案，都是笔者引用和分析的重要文献，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到目前为止，行动党正式出版的党史，只有《行动党25年奋斗史》（中、英文两个版本）。<sup>45</sup>这是由当年的政治教育局主任柯嘉逊博士，以〈民主行动党1966-82的史论〉之文本为依据，<sup>46</sup>经扩大补充后所撰写的一部党史。遗憾的是，该部党史写得十分粗造，连数据排列的工作都有不少遗漏和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政党宣传品，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93年，行动党庆祝建党廿五周年时，曾经汇编了一本文献特刊，以四种语文的形式，收录了该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应政治形势变迁的需要而颁布的六份宣言。<sup>47</sup>这些宣言反映了行动党的基本意识形态、路线和政策，是研究行动党历史十分重要的材料。另外可供研究行动党在建党之初的意识形态专书，是由西德社会民主党属下的Friedrich Ebert Stiftung基金会赞助、Alex Josey编写的《亚太地区的社会主义》。<sup>48</sup>该书收录了包括民主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和亚太地区其他社会党及工党的领袖，在1972年5月1日赴新加坡参加社会党国际亚太局会议时所发表的工作论文。其中林吉祥提呈了题为〈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与未来〉的论文，概括出在一个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多分化

45. DAP, *25 Years of Struggle: Milestones in DAP History* (Petaling Jaya: DAP, 1991); 民主行动党编：《行动党25年奋斗史》（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1991年）。

46. 有关文本收录在民主行动党编：《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1982年），页52-74。

47. 民主行动党编：《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1993年）。

48. Alex Josey, *Asia Pacific Socialis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3).